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曹刚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策划编辑：胡明峰
责任编辑：张俊 符爱霞
装帧设计：肖辉 彭莉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曹刚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0-13402-4

I. 明… II. 曹… III. 佛教—方志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084 号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MINGDAI FOJIAO FANGZHI YANJIU

曹刚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0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82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300-13402-4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080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 62515195 8250176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序言（一）

万明

方志，是地方的史志；佛教方志，乃地方佛教的史志。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发展到唐代达于鼎盛，其后，学界一般认为进入了衰落期。明代，佛教在经历了入华上千年的历史洗礼后，究竟是何面貌？读刚华所著《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知佛教方志的编纂兴盛，远迈历朝，明代是中国佛教方志发展的定型时期，数量繁多，现存的就有近百部。于是给我们一种与衰落无法联系起来的深刻印象，并昭示我们，佛教在明代出现了复兴。

陈垣先生是中国佛教史籍研究的开创者，他曾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刚华传承前辈开创之学，以其深厚的史学修养、扎实的学术功底、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严谨务实的治学作风，求真寻源，弥补了以往明代佛教史籍研究的空白，开拓了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

经过多年以来的资料积累和爬梳整理，《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完成，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由衷地为之高兴。而刚华索序于我，不敢推脱。回顾刚华与我相识，是在他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完成之后，转向明代佛教方志研究辛勤耕耘

之时。而我在2004年开始明代诏令文书研究，到2007年，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明大诏令集洪武朝卷）正式启动，当时刚华已入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站，他慨然应允加入我们课题组，承担明代佛教方志中诏敕的收集、整理部分。并在对明代佛教方志中的诏敕进行了系统收集后，撰写出专题论文，使我们对明代有关佛教诏敕的原始资料保存与利用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对于明代佛教乃至明代史研究，都可说是新的贡献。

明代是地方史志发展繁盛的时期。方志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宋元以前的方志多已散佚。明代从洪武至崇祯，从内地到边远地区都编纂有志书。根据巴兆祥先生《方志学新论》中的不完全统计，明代修志约3470种，数量极为可观。但流传至今的仅约1014种，约占明志总数的29%。佛教方志是明代方志的组成部分，留存近百部，弥足珍贵。

佛教发展与寺庙有着密切的关系。传教送法、刊刻佛经、创立宗派都是以寺庙为中心进行的。随着寺庙的形成规模化，兴废沿革便是历史，修志以存史，产生了专门的方志。佛教方志有的乃一地域寺庙历史沿革、山川形胜等；有的以山为名，专记一山寺庙兴衰；也有的是某一寺庙的专志。佛教方志始于魏晋，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古人云：方志乃一方全史。如果说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那么佛教方志所组成的就是地方的佛教史，若综合起来，那就是中国的佛教史。就此意义而言，留存于世的明代佛教方志，可以给我们一个明代佛教发展的大致面貌。

明代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思想文化上是儒佛道达到了高度融合的时期。时代特色也影响到佛教的发展。明代佛教虽然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时期活跃，但儒释道高度融合，佛教世俗化空前。概言之，有明一代佛教可以说有两度复兴。

其一，是在明初。为佛教在明代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明太祖。明太祖少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于皇寺出家为僧，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位以后对佛教采取大力保护政策，完善佛教僧寺制度，使洪武年间寺庙与僧尼数量获得迅速发展。当时不少僧侣被召参与政事，获得官员身份，有的被任命出使外国等，寺庙的政治、经济势力急剧扩张，这些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根据刚华的研究，明代佛教方志中收录洪武

朝至万历朝诏敕 219 条，其中最多的是明太祖诏敕，共 99 条，几乎达总数的一半。由此可知，明太祖对于佛教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国家对佛教的复兴深具影响。我近年翻检《明太祖御制文集》，见有关佛教方面的诗文达 65 篇（未计同一题名下多篇者），其中包括诏敕 8 篇，论、说、赞、记等文 40 篇，诗、歌 17 篇。而去秋赴台得见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其中也有 4 件与佛教有关（包括敕谕 1 篇、祭文 1 篇、诗 2 篇），并为太祖文集所不录。以上均可作为明太祖与佛教关系密切之见证。由此想到的是，我们也不应忘记佛教政策之外因素的考量。

其二，是在晚明。晚明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直接表现在寺庙的发展上。晚明佛教方志大量刊行，体现了晚明佛教的复兴，也修正了我们对于明代佛教的认识。现存大量佛教方志组成了具体的地方佛教发展史。

以《金陵梵刹志》为例。这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刊刻于南京僧录司的南京佛寺专志，是葛寅亮任南京礼部郎中时所编。此志以《御制》、《钦录》置于卷首，专门收录皇帝的诗文诏敕。其下分别记述灵谷、天界、报恩三大寺以及其他大中小佛寺 150 多所。记录包括历史沿革、山川古迹、庙宇建置、人物传略、寺产规约、游记题咏等，而敕赐寺名是首先要标明的。这部综览明代南京佛教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乃至沿革兴衰的史志，反映了晚明南京佛教的繁盛景象。

根据西方学者艾伯哈德（Wolfran Eberhard）对寺院建筑的统计，唐代之后建筑佛教寺院最为活跃的时期是 1550—1700 年之间，而西方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对于晚明士绅投入寺院捐赠的考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晚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化，学界一般认为晚明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由于阳明心学而趋向活跃，经世致用渐成社会思潮，是其间的重要内容。佛教的复兴即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万历年间，佛教出现了四大高僧：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不仅毕生以复兴佛法为己任，而且学贯儒释道，倡导佛教的民间化。这些佛教人士与士大夫建立了广泛交游，而士大夫居士的大量出现，使晚明佛教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此时佛教不仅与儒、道融合，形成“三教合一”的真实场景，而且完全融入了地方社会，成为地方建设的重要组成。如果说明代佛教的世俗化，

明太祖已开其端，在他对于佛教的诏敕中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关怀；那么发展至晚明，佛教的世俗化则汇入了当时的经世社会思潮，从而使佛教的再度复兴显示出新的特点和面貌。当时佛教的复兴，直接体现在佛教信仰推动地方公益活动上，主要表现在地方的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救济贫困等诸多方面。佛教人士与官方、士大夫以及一般民众建立了一种良性关系，促进了地方社会发展，也推动了佛教自身的发展。

西方学者卜正民通过对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晚明时期，国家已开始与社会分离，寺院成为公共领域。根据刚华的研究，晚明刊刻的佛教方志收录有大量的明代诏敕，无论是官方、士人还是僧人所编撰的佛教方志，都有这种编排现象。而且与传统方志比较，佛教方志将诏敕放在开篇的多了，单独设置诏敕类的多了，将诏敕放在艺文类的少了。他认为“这些都显现佛教方志编撰者的皇权意识的增强”。而我注意到的是，明代佛教方志体现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由于诏敕的加入，映现出了国家的身影。且方志中万历诏敕数目仅次于明初洪武、永乐朝，排在第3位。就此而言，国家没有与地方社会分离，寺院又如何成为公共领域？

刚华的书是对明代佛教方志的首次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希望读者从中对明代佛教方志的文献价值得到更多的认识。

是为序。

2011年1月7日于京西

序言（二）

韩格平

“得路到深寺，幽虚曾识名。藓浓阴砌古，烟起暮香生。曙月落松翠，石泉流梵声。闻僧说真理，烦恼自然轻。”此为方干所作《游竹林寺》诗。方干为唐代著名诗人，科举不顺，遁迹江南，竹林寺古刹、梵音的特定氛围以及寺僧的谆谆教诲，使其获得了面对现实的精神动力，故作诗以记之。竹林寺始建于东晋大兴四年（321年），刘宋高祖即位后改名鹤林寺，明万历年间寺僧明贤撰修《鹤林寺志》收录此诗。《鹤林寺志》详细记叙了与鹤林寺有关的山川、建置、山界、田土、高僧、人物、异事，亦选录了历代文人所撰的碑铭、古碣、记、序、疏、说、诗。通读全书，能够使人了解该寺的自然环境、兴废沿革、高僧事迹、僧俗交往等等，进而了解该寺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经过历代高僧不断践行的寺僧文化。明代是“中国佛教方志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同寺志记载着不同寺庙的历史与文化，众多寺志共同展示了明代佛教丰富多彩的历史与文化。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佛教方志（包括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成果很少，实为学界一件憾事。

2007年9月，曹刚华君前来做博士后研究，提出专门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设想。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过程中，刚华君充分利用其较为坚实的历史文献学修养和撰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学术积累，在认真审读现存一百余种明代佛教方志的基础上，参酌前人论著，潜心钻研探究，勤奋刻苦自不待言。亦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大力资助，出站报告《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得以按时完成。可以说，该报告是对现存明代佛教方志的首次全面梳理与研究。其中，关于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原因，关于明代佛教方志的编撰、刊刻与流传，关于明代佛教方志的体裁、体例与修志认识，关于明代佛教方志的佛学价值，关于明代佛教方志的文献学价值等专题论述，条理清晰，材料充实，具有自己的独到认识。该报告不仅是当前明代佛教方志的又一研究成果，而且为刚华君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他撰写的《明代佛教方志与明代诏敕研究》、《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两篇长文即为明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相信，刚华君还会有更多的论著问世。最近，《明代佛教方志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后期资助，将正式出版。我为刚华君感到高兴之余，亦期待着学界方家的批评指教，我想，刚华君亦有同感。

是为序。

2011年3月6日于京师园寓所

绪言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意义

中国佛教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是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源。其中，佛教方志更是以独特的魅力在佛教史籍乃至中国历史文献长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清人所说：“一寺之志亦犹一国史，为不可少者。”^①

中国佛教方志的学术价值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考证了明代佛教志书《吴都法乘》，开现代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之先河。然而应该说，对于中国佛教方志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至今仍很缺乏。

什么是中国佛教方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未有明确说明，民国学者张相文撰有《佛学地理志》一书，名虽曰佛学地理志，实则探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发展史。^② 后续学者赖永海曾给佛教地理志下过定义：“指的是以记叙佛教发源地和流布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名胜古迹（尤其是寺塔）、人物传说和佛教状况为主，兼及其他的一类佛教典籍。佛教中的地理类著作，既具有一般地理志的性质，又有佛教内涵，它们更着力于反映佛教的历史文化。”^③ 《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编者认为，它“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以某地或某山、某寺为范围的佛教史籍”^④。

①（清）释密林持松：《虞山兴福寺志》跋，民国八年常熟开文社排印本。

②（民国）张相文：《佛学地理志》3卷，民国十四年中国地学会排印本。

③ 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④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序言，台北丹青图书公司印1985年版。以下所引佛教方志，如未标明版本者，皆为此本。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中国佛教方志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佛教方志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有一定体裁体例的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献,如佛教寺志、山志、庵志、精舍志、塔院志等。广义佛教方志,则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宋史》、《明史》等正史与传记、别史、碑铭、文集等对佛教名山、寺院的记载。

就属性而言,佛教方志具有宗教性、史学性、文献性与地域性。宗教性指它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产物之一,和中国佛教有着紧密联系。史学性指佛教方志记载的佛教发展史或佛教人物事迹等内容,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性指它是以某种材料为载体,靠编撰、复制而传播的一种文献。地域性则是指具有一定的区域空间范围,大可至全国范围,小可至一个寺院。

概言之,佛教方志就是指记述佛教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发展情况的史志,是一种区域性的佛教历史地理著作和资料的总汇。

限于时间与精力,本书主要研究明代佛教方志。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它上承宋元,下启清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代也是中国佛教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方志肇始于魏晋时期,历经隋唐宋元发展,至明代繁荣,多种体裁的佛教方志在此时期出现,目前保存下来的明代佛教方志有近百部之多。此外,明代佛教方志上承唐宋佛教方志之优秀传统,下启清季、民国佛教方志之撰述。这些都足以表明明代在中国佛教方志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有四点:

首先,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佛教方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迅速发展并流行开来,逐渐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文化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土传统文化之中,三教(儒、道、佛)思想由斗争走向趋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嬗递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由佛教僧人与居士撰写的佛教方志,恰恰从佛教角度,记录了长时段佛教发展、融合的过程,不仅如此,也记录了各个时代、宗派佛教徒眼中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及民众思想。这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有着重要的

价值。我们也看到，虽然已有学者注意到明代佛教方志的价值，但把其作为一个群体文献做整体研究的，尚不够深入。因此，本书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学术史、佛教史、史学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对中国佛教文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有所补益。

其次，可以较深入了解宋元明时期佛教发展的具体情况。明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隋唐、宋元时期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净土宗以及禅宗的各个宗派，在明代或为盛行，或为衰落。同时，佛教发展与明代的帝王政治、儒道二教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佛教史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官方典籍中反映甚少。如《明史》只著录少许僧人，这种记载明显具有以儒家为主的偏颇性，与明代佛教的真实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后人研究明代佛教史造成很大的障碍。通过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明代佛教的真实情况。如可以利用《江心志》、《清凉山志》、《鹤林寺志》等佛教寺志研究明代佛教地域化的进程；利用《临平安隐寺志》、《径山集》、《金陵梵刹志》等研究明代佛教与政治、宗派融合与斗争的关系、明代佛教与文人的关系；利用《泉州开元寺志》、《雪峰志》等考察明代佛教寺院的经济状况；等等。这些明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在佛教方志中都有反映。

再次，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佛教方志在历史编撰学、佛教文献学上的价值与地位。中国佛教方志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中一个奇葩，它具有两重性：一是佛教方志中所宣扬的佛教教义理论，如佛教史家运用佛教垂迹论、因果论、三时论评价历史人物，品谈社会变迁。但这也导致中国佛教方志中某些荒诞性、神秘性色彩，迟滞了中国佛教方志发展。二是给予中国佛教方志新生命与力量的传统历史编撰学，在其影响下，佛教史家自觉地借用资世存史、体裁体例、实录直笔、人物评论等概念，编撰传统史学化的佛教方志，促使了中国佛教方志学的全面发展。

此外，明代佛教方志无论是对清代佛教方志还是传统方志的编撰，都有深远的影响。清代佛教方志层出不穷，如闻性道《大慈寺志略》、曾鲁《鄞县锡山宝严寺志》、释通新《天井寺志略》、范昌治《庐山秀峰寺志》等，这些清代佛教志书皆受到明代佛教方志的影响。明代佛教方志的编撰体裁和体例与传统史书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因此，它无论是在历史编撰学，还是佛教

文献学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最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佛教文化越来越成为民众旅游、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去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佛教山林、寺院都开始重视本山、本寺方志的撰写，编撰了许多佛教方志。^①其中有体例新颖、编撰得当的《真如寺志》、《云翔寺志》、《国清寺志》、《南山寺志》、《六榕寺志》等优良佛教方志，但也出现了一些乏善可陈的佛教方志。而明代是中国佛教方志的定型时期，在融合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编撰上有着十分宝贵的经验。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既具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又能对现当代以及后世佛教山志、寺志的编撰提供丰富借鉴，具有很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二、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总的来说，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可归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状况。

（一）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佛教方志始于魏晋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它记载当时洛阳城内寺院林立的状况。所谓“释寺之有志，仿于洛阳之记伽蓝。”^②自此，历代方外、方内都重视佛教方志的撰述与著录，出现了《释迦方志》、《古清凉传》、《广清凉传》、《九华山志》、《少林寺志》、《吴都法乘》等一大批佛教方志文献。而这些重要佛教资料也在历代官方、私家著述目录中得以记载与评价。在四部分类法中，佛教方志被划归到史部地理类专志中。

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官方的，如《明史》、《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私家的，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①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佛教寺院编纂内部流通和公开出版的寺院志、山林志有近百部，既有20世纪80年代的《广德寺志》、《新编少林寺志》、《洪洞广胜寺志》等，也有最新编撰的《云翔寺志》、《衢州明果禅寺志》、《真如寺志》等。关于具体情况，以后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言。

^② （清）毛奇龄：《西河集》卷54《杭州慈云讲寺志序》，《四库全书》本。以下所引文集，如未特殊标明的，皆为此本。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此书不分经史子集，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佛书在寒字号，范围包括佛经、注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佛教方志也在此中，著录了《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补陀洛传》等佛教方志，由于其成书较早，因此对明代佛教方志文献没有关注。其后的《明史·艺文志》对明代佛教方志较为注意，著录了汪可立《九华山志》、周应宾《普陀山志》、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等10余种明代佛教方志。

清代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18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如果说它记载释氏类史书是一大退步^①，那相比前代，它在记载佛教方志上则是一大进步。原因在于《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认为佛教方志“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而纯非佛教典籍也。^②故编撰者著录《破山兴福寺志》、《径山志》、《吴都法乘》、《邓尉山圣恩寺志》、《禹门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有17部之多，且每本书的编撰者都从作者、源流、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角度加以考证论述。

相比官方，这个时期私家著录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主流。

第一，版本目录，以登记、查核所收珍贵名本为主要的书目。如《季沧苇藏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这些书目是以书籍的版本作为收录的标准，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中从版本角度著录《天台山志》。

第二，登记、考订书目。这是明清私家书目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书目，以记载私家藏书、考订艺文为主，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徐燊《红雨楼书目》等。这类书目由于受明清书目变革风气影响，其分类体例上也多为不同。或作《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或按《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收书范围上，有的仅收一代之书，有的则好蓄异书。这些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也有影响。如《千顷堂书目》主要著录明朝一代文献，并兼补宋金元艺文志之缺，在著录佛教方志上，就十分重视明代的文献，著录《金陵梵刹志》、《祈泽寺志》、《栖霞寺志》、《长水塔院纪》等明代佛教方志45部之多。《红雨楼书目》则著录《法海寺志》、《黄檗山寺志》、《天目山

^① 参见拙文《试论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0《地理类》“武林梵志”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

志》等明代佛教方志 23 部。

此外，关注明代佛教方志的补遗价值是明清学者注意的一个方向，这种研究多着眼于明代佛教方志与宋元明人文集、方志的补遗之间关系。正如清人评价《武林梵志》曰：“备纪名流胜迹、高僧支派，各编小传，序录井然，颇有条理。其中采辑宋元明人诗文，如仙林、崇先二寺记见曹勋《松隐集》，《智果寺记》见徐一夔《始丰集》，而志俱失载，不免稍有脱漏。又如宋张敦礼舍钟之法云寺，非杭之法云寺，而以名同误入。又撰《法相寺碑记》者，前作范楷，后作沈楷，亦有驳文。然其搜剔幽隐，实多《武林遗事》、《西湖游览志》所未载。如《明远堂诗》次于苏轼诸作之后，而《东坡集》无之，张九成《喻弥陀塔铭》亦不见于《横浦集》。张伯雨《天池楼诗》与本集互异，可以参考。其遗闻轶事，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正，不徒为伽蓝增故实矣。”^①

整体看来，由于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官方与士大夫对佛教方志的分类、著录与评价有失合理之处，没有较系统的研究。

（二）20 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以来，随着佛教与佛教史籍研究的发展，新的治史方法传入国内，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步。

20 世纪上半叶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对中国佛教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治学方法，或结合刚传入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古代佛教问题作多方面的考证与研究。在佛教方志方面，以研究六朝的佛教方志《洛阳伽蓝记》为主流，对明清佛教方志则间接提起。^② 陈垣先生于 1946 年至 1947 年间，先后在《大公报》、《辅仁学志》等刊物上发表系列短文对中国佛教史籍进行考论，其中考证了《吴都法乘》，对该书做了开创性的史料挖掘，见解深刻，高屋建瓴，至今对我们研究明代佛教方志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丁福保先生编纂著名的《佛学大辞典》，其中从版本、源流、刊刻角度对一些明代佛教寺志加以介绍（民国八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林在青在《元贤禅师的“鼓山禅”及其生平》一文中，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70《史部·地理类》。

^② 时人研究《洛阳伽蓝记》较多，如怡生：《〈洛阳伽蓝记〉版本述略》，《北平晨报艺圃》1935 年 12 月；刘汝霖：《六朝伽蓝记叙目》，《师大月报》1934 年第 8 期。

从思想、禅宗流派等 5 个方面对《温陵开元寺志》作者元贤禅师做详细考论，其间亦提及《温陵开元寺志》的创作动机（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1977 年版）。另外，1947 年《南京文献》连续两期刊发明人盛时泰的佛教方志《栖霞小志》、《牛首山志》，并加以点评（《南京文献》1947 年第 1、2 期）。陈鸿飞在《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一文中简单提及佛教方志的问题（《海潮音》1931 年第 13 卷）。

日本是海外较早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重镇，当时学者有服部俊崖、清原秀惠等人。服部俊崖在 1873 年至 1913 年间先后发表了《〈径山志〉解说》（《佛教史学》1911 年第 1 卷第 4 期）、《〈鼓山志〉解说》（《佛教史学》1873 年第 1 卷第 11 期）等文介绍明代《径山志》、《鼓山志》的编撰状况。清原秀惠在 1910 年先后发表《支那佛教寺志》，介绍中国古代佛教寺志书情况（《六条》1910 年第 89、90、92、96 期），开创了日本研究佛教方志的风气。

20 世纪下半叶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一个发展时期，尤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视野也变得广阔，宗教研究再次发展起来。1982 年，我国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1980—1985 年台湾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三辑连续出版流通，该丛书收录明清至民国的佛教寺志、山志 97 种。1996 年白化文、刘永明在此基础上，又搜集诸多珍贵佛教寺院志资料，编辑《中国佛寺志丛刊》出版发行，该丛刊收录 171 种佛教寺院志，其中有 31 种明代佛教寺志。这一切为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提供了条件。

这时期，系统、全面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著作和论文并未产生，但不少辞书、佛教史、学术史、思想史、方志史等著作和论文的内容涉及该项研究。据对近人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统计，有关论著 10 余篇，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成果涉及以下方面。

1. 提要式概述

以提要形式对中国佛教方志做一概述，有利于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佛教方志，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佛教方志的认识。

《中国佛教寺志丛刊》收录 171 种佛教寺院志，其中 31 种明代佛教寺志，编撰者对每本书都从版本、流传、传播角度进行了概述，为以后明代佛教方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张英聘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第 2 章第